

内外民主与威权主义的威胁

2023 年 9 月 19 日#WUJ 网络研讨会

©版权所有

Donald E. Kalsched, Ph.D.

Topsham, Maine

引言

在这个历史时刻，全世界的民主都在与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威胁进行生死搏斗¹。在乌克兰，每天都在与残暴的威权体制展开这场战斗，乌克兰的士兵死在战壕里，妇女和儿童死在街头。在为民主而战的痛苦和难以言表的悲伤之下，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和精神价值，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有时能体验到这种价值，而这正是我们的乌克兰同事为之奋斗的。

这份深刻的价值观，只有在人与人的挣扎和冲突中才能窥见一斑，其前提是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和自由权。即便如此，也只有在某些发自内心的时刻才能瞥见。像是林肯（Abraham Lincoln）在盖茨堡或者曼德拉（Nelson Mandela）于 1994 年在好望角的就职演说，或是欧巴马（Barak Obama）于 2008 年在芝加哥葛兰特公园的胜选之夜演说。这些时刻都带有超越性，似乎来自对立面之间的挣扎，透过神秘的「第三」得到解决。那是触动深层情感的疗愈时刻。而在威权政府中，精神不会飞扬，而是长驱进军。

我所说的民主超越「时刻」之所以能触动人心，是因为只有在自由中生活的人才能感动我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持续挣扎就是对民主的最佳理解，去对抗不可避免的威权主义威胁，那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抗争，而且常常会是民主本身内部的抗争。今天，我想谈谈这场抗争，同时以一个心理治疗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这个案例中，这份深刻的价值观在某些时刻「散发闪耀光芒」。我逐渐明白，心灵民主的争取以及对民主进程中固有的深层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争取，是与民主及意识两者的关系相关的，这种关系对荣格而言弥足珍贵。

去年，在乌克兰当前的战争开始之际，我在给乌克兰同事的一封信中试图表达民主与意识两者间不可言喻的联系。我在此重复相关段落：

你们的战斗是意识革命的一部分。独裁者总是会起来反对这种新的意识，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意识，但是为民主为平等而战、为多样性而战、为神圣的现实而战（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蕴含着上帝赋予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的火花），这比任何一场战斗都要伟大，而且必须在每一代人中反复进行。你们当中曾与受过创伤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在内心世界进行的相同战斗（是促进生命的新兴民主意识与心灵中暴力压迫的反生命力量之间的战斗）。现在，你们正在街头进行这场战斗。你们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战。你们是在为新生的自由而战，也是在为一种新的革命性意识而战，这

¹ 见 Applebaum, A. (2020). *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Levitsky, S. and Ziblatt, D.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种意识正在这个地球上慢慢形成（尽管面临巨大的阻力）。你们是在为你们国家的超越道德中心而战。尽管你们当前遭受创伤，但你们是为灵魂而战。我向你们致敬！²

解离与威权系统

在我对个别病患进行创伤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经常在帮助病患争取心灵民主，以对抗威权式内在防卫系统的暴政，这些防卫是围绕着存在恐惧和焦虑而组织起来的。这个系统，我称之为自我照护系统（SCS），在经历了早期创伤的混乱、痛苦和碎裂之后，为调节婴儿心灵所做的努力（出自于荣格所说的原初自性之概念）。这种调节的主要「作用因子」是解离防卫。通过观察创伤后所出现的调节人格的内在解离系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威权主义是如何扎根的，首先是在心灵上，然后是在世界上。

在我今天的论文中，我将描述我与某位男子的工作，这个人的心灵已经被这种威权的暴力防卫「系统」所占据。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脆弱的童真部分被强大的内在暴君既无情且恶意地压迫着。我的病人身上这些敏感而充满灵魂的部分是他所渴望更充实生活的关键所在，但在我们开始治疗时，这些部分在他的内在「立法机构」中没有合法的地位，在他的心灵「议会」中没有发言权或投票权。他内在这些需要和依赖的部分总是给他带来麻烦（至少他内在的控制暴君是这么认为的）。因此，需要和依赖必须被无情地压制，甚至在必要时被消灭。我们有个词可以形容这种心灵上的「消灭」，它被称为「解离」，而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威权主义。荣格从「情结」这个角度谈了很多关于解离的问题。但我今天要讲的解离是一种更严重的形式，是在儿童生命发展的更早期，甚至在儿童的经历被「建构」³成情结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比压抑等较温和的防卫更为猛烈。它的作用是扼杀我们对无法忍受的痛苦之意识觉察，或者通常是麻痹我们的痛苦感受，使它们完全不会被意识到。

因此，这种解离似乎攻击了自我和自体不想要的脆弱部分之间所有的联系。解离起初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努力，但因为解离是一种防卫，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否定、与情感断开、封闭、收缩和碎裂。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也不能把任何新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它试图通过控制和支配自体的脆弱部分来控制痛苦和恐惧的感觉，因为它「认为」⁴那是痛苦和恐惧的根源。这就导致了一种心灵的自体免疫疾病，整体的一个部分攻击另一个较不「被接受」的部分。这种内在压迫是威权主义的本质，同时构成了一种缓慢的自杀形式。在与我的病人麦可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你将会看到他挣扎着将心灵民主从这种暴力的威权暴政中拯救

² 见 Donald Kalsched, Letter to Ukrainian Psychotherapists, March 9, 2022.

³ 见 Donnel Stern's Unformulated Experience for an explication of this idea.

⁴ 当然，防卫系统不会有意识地「认为」。在身体的自体免疫疾病中，免疫系统被像是艾滋病病毒等欺骗，「认为」健康细胞是受感染的细胞，因而攻击和杀死健康细胞。我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认为」这个词的。

出来。这样的挣扎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接纳性的内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即使是「当中最小的」（马太福音 25：40）⁵也能在自体的政府中拥有发言权。

和麦可在一起时，我发现自己在努力创造一个人际容器，这个容器可以收容并守住他内在世界的对立面，同时还有我内在的对立面。他的内在世界是一个充满对立面的沸腾大锅，其中一些对立面彼此毫无意识。他天真童稚的脆弱与原始暴力对立，或是被多愁善感的「爱」所窒息；他满怀希望地向爱伸出手，却与无情的自给自足对立；他的温柔关爱天性与大男人主义的强悍及冷漠对立。麦可从未与父母或照顾者建立足够强大的关爱关系，以容纳关系中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这是源自于他自身的「原始」冲突部分。他从来没有哭过、叫过、需要过、依赖过、对自身的束缚愤怒过，也从来没有倾听过他的声音，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事实上，他曾多次试图表达自己，但他的感受都被父亲打掉了。⁶因此，最初的内心冲突变成了他与世界的冲突。他不再是与自己交战，他是在与无情的世界和他最关心的人作战....，包括我。可以说，他内在的对立几乎完全外化了，从内心的涵容挣脱而出，在他的世界里横冲直撞，造成了他生活中所有的「失序」。

民主：内在的与外在的

那么，怎样的心灵才能包含这样的对立面呢？荣格对此非常清楚。他说，那会是「民主的心灵」。荣格认为正常、健康的人格是由许多部分组合而成的。即使是自我本身，起初也像是无意识海洋中的群岛。对于刚出生的婴儿来说，最初的经历就像是感觉、情感、意象或记忆碎片的闪光画面。慢慢地，这些经验凝聚成「行进的画面」，有个中心的、见证的自我开始把它们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身份认同。但这个身份认同有许多面向（许多情感的部分），有些是「劣势的」，与其他「优势的」部分相冲突。如果成长中的孩子有幸拥有充满爱意和合拍的照顾者，那么这些相互冲突的感受就可以得到表达、处理和整合，而不会被排拒或驱逐出意识之外。不同的「我的立场」可以保有张力却不会威胁到人的完整性。这就是荣格所说的心灵民主。它的另一个词是「冲突心理学」。威权主义不能容忍内在的冲突，因此它将冲突的一极转移到世界中。⁷其心理术语是「投射」，而其机制是解离。

⁵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姊妹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新国际版圣经，马太福音 25:40, 45）这句话是特里萨修女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她经常引用这句话来支持她对穷人的事工。她所说的「当中最小的」指的是那些脆弱的人（无论是在社会、心理还是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如病人、穷人或身心障碍者）。自体内心最脆弱的部分就是受到创伤的部分。

⁶ 如果没有一个合拍的照顾者进行这种协同调节，孩子就必须自我调节。当然，他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由自性「协调」的解离就会替他做到这一点。

⁷ Philip Bromberg 博士是我在创伤领域的一位良师益友，他总是把自己与创伤患者的搏斗描述为协助将解离心理学转化为冲突心理学的努力。他是在为心灵民主而工作。

对个人如此，群体亦若是。当一个新兴国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它是由许多「部分」组合而成的。在集体生活中，我们知道这些部分是不同的「部落」、种族或性别、移民群体或具有不同宗教或性偏好的次群体。一个国家的健康与否，取决于这些对立的「组成部分」如何和谐共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冲突能否被制度、法律、立国文档和文化传统所容纳（为一个国家或个人带来丰富的小区生活和创造力），这在民主国家是可能的。

荣格生活在瑞士，瑞士是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之一。1946 当年，荣格在英国广播公司谈论「与阴影的斗争」(CW10, pp. 218ff) 时，他说：

在瑞士，我们建立了『完美的民主』，我们好战的本能以被称为『政治生活』的国内争吵之形式所耗尽。我们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互相争斗，我们倾向于认为民主是一种慢性的缓和内战状态。我们一点也不和睦；相反的，我们相互憎恨、相互争斗，因为我们成功地将战争朝内（introverting war）。(para. 455)

将战争朝内！因此，在荣格看来，朝内承受对立面过程决定了「民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情感能力和韧性。情感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但它涉及心理上的受苦。因此，它得之不易，也很容易失去。这种能力决定了个人同时也包括群体的健康。

但还有更多的东西让民主成为荣格所说的「高度心理机构」(highly psychological institution)⁸。在荣格看来，意识在这个星球上的演化，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朝内）保持对立面之间的张力。心灵中对立面间的动搏斗产生了意识！荣格独一无二地认识到，民主是针对早期威权制度的发展成就（朝内的及朝外的）。当两个对立面的张力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产生了超越的「第三」(third) 时，意识就会进步。荣格将这种神秘的「第三」称为超越功能，他认为这种辩证法是意识在心灵中和世界中的进步。「超越功能」是荣格对我们为获得更高意识而搏斗的深层道德和精神价值的称呼，我在本文开头部分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最佳的民主不仅仅是组织自身或国家各部分的另一种方式。尽管它效率低下、争论不休，但在其最佳状态中⁹，内在和外在的民主促进了对立情感和对

8 「最好知道你最大的敌人就在自己的心中。人的好战本能是不可磨灭的……真正的民主是一种高度心理化的制度，它考虑到人的本性，并为[内在]冲突的必要性留有余地……」（同上，段 456，夹注号为笔者所加）。

9 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民主并非「免于」导致威权主义的解离防卫和对立交战。事实上，正如荣格所说，它的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将战争朝内」(introverting war)。但是，由于内心冲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焦虑，容纳和调节「内在战争」的容器总是会被打破。例如，当前美国民主社会中所谓的「文化战争」所引发的两极分化言论和死亡威胁。R. T. McKenzie 写过一本重要的书，名为《我们这些堕落的人》(We The Fallen People, 2021 年 InterVarsity Press 出版)。他在书中指出，美国民主不应该被理想化，它只是反映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人心既有「天使」，也有「野兽」(p.264)。民主不会把我们自身中「拯救」出来。相反的，我们必须将民主从我们自身的不宽容、我们自身的威权倾向中拯救出来。

立观点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产生意识所必需的。与此相反，受恐惧驱使的威权主义以秩序和控制为名，将交战的对立面加以解离，出卖内在的复杂性和自由，为的是一份安全感。这意味着对立面的解离，因此就是无意识。为了包容冲突及促进心灵的内在民主，其中有着必需的痛苦，以下是荣格对此的看法：

如果要治愈被投射在外的冲突，就必须让它回到个人心灵，因为它是从那里无意识开始的。他必须与自己共进最后的晚餐，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这意味着他必须承认并接受自己身上的[劣等]他者。（同上，段 512）这并不是管理个人生命或公共国家的受欢迎秘诀。

自我照护系统

我在早年创伤患者身上发现的威权防卫系统，我称之为自我照护系统（SCS）。下面这张图显示的就是这一系统及其两大原型「力量」。这是 William Blake 的一幅插画，名为「善恶天使争夺着拥有一个孩子」。



我后来理解到这些「天使」是心灵中原始解离力量的化身，而「孩子」则是他们力量中人类脆弱的化身。这两个「天使」在创伤的火山爆发中诞生，对于他们照料下的「孩子」所展现的脆弱人性缺陷，他们既被吸引，也感到拒绝厌恶。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都是属于心灵集体层次的原型力量。因此，它们是由荣格所说的自性所「协调」的，构成了 Michael Fordham 所谓的「自性的防卫」（defenses of the Self）。最终，它们不得不被人性化，并受到自我的控制，但这一「人性化」过程对它们来说是一种羞辱，它们将以复仇的方式抵制这一过程。他们是来自集体无意识的威权者，他们不希望被「民主化」。

为了将他们所照料的脆弱儿童解离，解离系统似乎使用了 Blake 的「天使」所代表的两股对立能量。其一是攻击和暴力，由左边的黑暗天使为代表。另一个是自我安慰和假象、心理麻木以及施展「咒语」（包括成瘾行为）。这就是右边

的光明天使的工作，受惊的孩子正逃向它的臂弯。这两种都是情感消亡的防卫。其中一个天使切断并瓦解；另一个天使封装并提供必要的假象（让自己能活着的神话）。一个天使是保护性的，另一个是迫害性的。两者都是将自我从难以忍受的痛苦感受（现实）中分离出来。

当我第一次在创伤幸存者的梦中遇到黑暗天使时，它对内心世界受伤儿童的暴力和恶意令我震惊。但我发现，许多精神分析临床医生都能在病人的素材中发现这种暴虐的内在客体。Michael Sebek¹⁰将内在极权客体 (*inner totalitarian objects*) 描述为内化的父母客体，并通过儿童的依赖性而放大；Bion¹¹ 谈及「破坏性超我」(destructive superego)，一个敌视情绪经验获取的内在「上帝」，对内在世界各部分「连结之攻击」(attacks the links)¹²；Fairbairn¹³ 描述了一个「内在破坏者」(internal saboteur)，他攻击无辜的、退行的「原欲自我」(libidinal ego)；Anne Hallward¹⁴描述了一个内在的「法西斯政权」(fascist regime)，其目标是让我们保持沉默和孤立，从而增加羞耻感。我个人的工作则是将这种内在形象视为原型防卫，化身为但丁名著《神曲》里的可怕怪物「迪斯」(Dis)，它操控如地狱般的内心世界，其中充满了疏离的情感和支离破碎的创伤记忆。「Dis」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即「解离之主」。他的暴力是解离系统中清楚易见的两种天使力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威权心态。

在患者的内在世界中，「迪斯」的声音是不折不扣的否定和批判。如果孩子落入他的手中，就会立刻感到羞耻，同时发自内心感到自己是「坏」的、毫无价值的。与此相反，光明天使则试图用另一种不那么痛苦的理想化现实来支撑孩子的幻灭失望感。这个天使的职责是用正面的事物来对抗黑暗天使的负面性，从而维持希望（尽管这种希望往往是虚幻的，是一种「虚假的希望」，或者是Martha Stark所说的「无情的希望」(relentless hope)）。这就是被各种治疗师所称的「灵性逃避」(spiritual bypass)，意指藉由「进入头脑」和进入精神世界来避免身体上的痛苦感受，而在精神世界里，另一种现实似乎是可能的。阴谋论是自我照护系统(SCS)中「光明天使」的拿手好戏，每当现实过于痛苦而让人无法接受时，「光明天使」就会成为「造谣」高手¹⁵。如果光明天使能制造足

¹⁰ Sebek, Michael, 1996, "The fate of the totalitarian object".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Vol 5, 1996 Issue 4

¹¹ Bion, 1970: 112 (see p 92-3 of Trauma and the Soul)

¹² Bion, Ibid.

¹³ Fairbairn, 1981

¹⁴ Hallward, Anne, January, 2019, "We Need to Talk" The Sun Interview by Amy Amoroso; The Sun Magazine, Issue 517, 2019.

¹⁵ 光明天使说：「假新闻」。它从未真正发生过。创伤是个谎言，是「假旗行动」、「除了我之外谁都别信，只有我能解决它。」此时此刻，美国政坛上就有一位被光明天使附身的人。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一头金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点石成金般的财富。他像国王一样住在有着金色吊灯的塔楼里，开着印有自己名字的飞机四处飞行，认为自己「凌驾」法律。这给了他魅力，而他不需要像我们这些在「中土世界」挣扎的普通人，轻松就赢得一切。但是，由于公众中的某些群体需要一个救世主，他们把光明天使投射到他身上（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天使的解离暗黑孪生兄弟是一头野兽，有着多桩犯罪起诉的怪物）。通常情况下，两个天使的身份会同时出现在

够的恐惧和愤怒，就能为黑暗天使的暴力提供理由和养料。两者相互配合。

要记住的重点是，这些神话力量（暴力和幻觉）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它们定义了威权心态的两个极端。在健康的人身上，它们可能一方面表现为健康的攻击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创意想象力。但在受创伤的人身上，他们的内在世界被恐惧挟持，这些原型力量无法用于真正的生活，而是被用于防卫目的。以心理学的语言而言，它们是无处不在的诱惑，要么是正向的膨胀，要么是负向的膨胀（要么是理想化，要么是恶魔化），没有中间的其他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活着的地方（中土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爱和人类的恨都是可能的¹⁶。

最后，在我们的自我照护系统（SCS）图像中，我们看到一个孩子逃进光明天使的臂弯。如前所述，我把这个孩子看作是病患过去历史的内在小孩（在创伤过往中受苦的脆弱感和受伤感），就是上文提到的耶稣寓言「当中最小的」。我发现，所有创伤的疗愈都必须透过这个受伤的内在孩子。这意味着邀请受伤的孩子出现在治疗所构成的「场域」中，进而意味着要与守护天使讨价还价，因为它们不希望让内在孩子与系统「外」的人发生关系。

当受伤的孩子前来心理治疗，他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作为失去的第三（third），这种神秘感可能表现出难以言喻的特质（治疗工作中难以描述或定义的超个人维度），恩典的体验会是接近的描述。荣格关于「儿童原型」的文章就是为了接近这一奥秘所做的努力。他在文中提到「神圣孩童」正是人类灵魂的形象¹⁷。

案例：麦克及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人性化容器的努力

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我与「麦可」的工作，藉之说明自我照护系统（SCS）是如何扎根并在心理治疗中慢慢得到转化。当我第一次见到「麦可」时，他是一个讨人喜欢、有魅力、极具男子气概、自恋的男人。他的妻子因其「愤怒问题」而将他转介给我，其中涉及我先前提过的「公路爆走」事件。

一个人的身上，他受到这些原型解离力量的保护（既是野兽，又是救世主）。结果就是成为一个充满妄想的自恋狂，对自己的「纯真」和支持者的「善良」成痴，而在其内心深处，从多愁善感的孪生兄弟中分裂出来的虐待狂暴正蓄势待发（就像希特勒一样），他杀死了数百万人却丁点没有悔意，但据报导，当他的金丝雀死掉的时候他哭了！

¹⁶ 正如我们将会在我的病患身上所看到的那样，麦可在高速公路上频繁出现的怒意中给黑暗天使的暴力「开路」。接着，在残酷的争斗之后，他常会伤害对方司机，之后会感到难过，再把受伤的受害者送到医院，并在事后照顾伤者和伤者的家人。这就是光明天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麦可都完全没有「感觉」。他就是「愤怒」，他就是「怜悯」，为他的天使「保护人」开路。这就是自我照护系统（SCS）解离能力的运作方式，如果我们成为它们，我们就无法「看到」他们。

¹⁷ 在我的第一本书《创伤的内在世界：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心灵如何回应》（心灵工坊，2018年/Routledge，1996）中，我将这个孩子描述为「不灭的个人精神」（imperishable personal spirit）或灵魂。

但是，除了公路爆走事件之外，现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他妻子最担心的问题）——是麦可开始无法控制地恐惧和焦虑，担心失去他刚出生的儿子（一个出生时患有严重黄疸病、特别脆弱的婴儿）。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安全地在家里。但麦可仍然无法停止担心和纠结。他会在许多不眠之夜站在婴儿床前，检查他的呼吸，为想象中失去他而哭泣。

在最初的治疗过程中，麦可因情感风暴和零碎片段的创伤记忆而情绪失调，他不得不像笼中的动物一样，边和我说话边来回踱步。几周后，他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们开始探讨他的早年经历，其中包括从两岁开始，他那军国主义般的父亲就经常用木棍殴打赤身裸体的他。在这些虐待事件中，麦可拒绝哭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不让父亲称心如意能「打垮他」。麦可忠于母亲，18个月大时，他的弟弟出生了，麦可开始变得极其伤心。他行为失序，跑到邻居家去，愤怒时还会摔东西，严厉的惩罚总是接踵而至。例如，他的父亲会在他的脖子上套上项圈，并将他栓在前院的狗链上，以此羞辱他、防止他在父母外出时逃跑或毁坏东西。

麦可的行为失序并没有在童年结束。整个青春期，他都给师长惹麻烦。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在学校经常受到学生甚至老师的羞辱。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受苦于这种羞辱。为了报复，他经常在晚上闯入学校，在羞辱过他的老师桌子上大便。他成了一名盗窃能手，在18岁之前就被指控犯多项重罪。他的母亲和当地牧师总会把他保释出来，并减轻对他的指控。这些事件发生后，他的父亲拒绝和他说话（对他「不理不睬」），并不断用蔑视的言语让麦可知道，他对自己的儿子感到多么「恶心」。

就像那些在童年时期反复遭受灾难性创伤的病人经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麦可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不带任何情感。他无法为父亲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悲伤或愤怒，他甚至不觉得自己的遭遇糟糕到值得我的同情。随着我们之间情感的升温，这种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多数时候，麦可会以一种不屑一顾的大男人主义态度的黑色幽默和玩世不恭的笑声来讲述他童年的可怕细节（像是狗链事件）。接着，在他的眼角余光中，他会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因为我认真对待他小时候必定经历过的屈辱。这让他允许自己去感受一些痛苦，结果是他越来越能够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和难过中，并带着童年受辱时的愤怒。内在受伤的「男孩」开始经常进入我们之间的空间。在治疗工作一年后的某天，他带来这个梦：

我们在一家大饭店里。我是这个孩子的保镖，这孩子不知怎地似乎很神圣或特别（几乎就像是圣子）。他在隔壁房间，*不知为什么这孩子并不知道他是谁*。我能感觉到有个恶人存在（他是来找这孩子的，而且就在附近）。我开始提高警觉....警戒！然后，「恶人」引发了一场爆炸，我跑进孩子的房间。他约莫5到7岁左右，爆炸就发生在他隔壁，孩子受到了惊吓。我认出了他，知道他是谁.....眼前闪过他的生命画面。

我在男孩旁边坐下，知道爆炸只是为了戏弄他。如果他们真想杀死这个孩子，他们早就动手了。我开始摇晃这个男孩，喊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他的眼睛直直盯着我，然后朝后脑勺翻了白眼，我看到他脸上

露出一丝微笑。也许我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但他不正视我。我感到非常沮丧。我无助地哭着离开房间，我无法与这个孩子接触！

最后，我试图把这个梦告诉楼上的一个男人，在场有位女士指示我把整个故事告诉他。我如释重负，但却卡住了……就像被电击或失忆了一样……*我记不起这个男孩的生平故事*。我想也许我应该回去看看他的历史，但如果我回去了，就永远也逃不出「恶魔」之手。我带着满身大汗醒来。

这个梦以及其他类似的梦，是我第一次窥见（回推到 80 年代）解离是如何阻止创伤经历被记起，以及它是如何借助暴力、愤怒等情感来「杀死」（炸毁或消灭）冒犯性的情感记忆。在麦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他的情感记忆碎片是如何进入意识的，而「疯狂炸弹客」（黑暗天使）又是如何用爆炸性的愤怒来抵抗这一切。他的梦为我们描绘了这种内心挣扎，它成为对立面的象征性容器和促进心灵民主的小型戏剧。

在移情中，麦可允许自己感受童年早年自体的真实悲伤、难过及痛苦（在他的仇恨和愤怒情绪之下的感受）。这在他的梦中被描绘成一个恍神的特别孩子。麦可梦中的自我想要与这个受伤/神奇的孩子接触，但这与「恶人」对立，后者试图消灭这个孩子（黑暗天使）。后来，梦中的自我想「把整个故事讲给楼上的一个人听」（麦可认为那是指我，因为我的办公室就在楼上），但他又一次被阻止了，因为梦中人似乎「遭电击或失忆之类的」（这显然是指解离）。因此，随着疗愈的开始，与防卫的战斗也开始了。

这是为心灵民主而战的典型例子。随着心理治疗的开始，他的心灵也开始渴望整合。梦中的自我有份内在的渴望，想要与这些被离异的、受伤的、过于人性化的、内心的未成年部分联系起来（救赎之，让他们重回被放逐的人群）。但权威的「系统」却以解离为生，以复仇的方式抵制之。

无论如何，随着我们治疗过程的发展，麦可开始感受到他那羞愧的、受伤的「内在小孩」的存在，他的身体也有了更多的感受。在会谈中，他的双眼经常充满泪水。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的黑暗天使就会占上风（他会起身，在房间里踱步，愤怒地握紧拳头）；然后又坐下来，流下更多的眼泪；然后更加愤怒，更多踱步。脆弱的情感和对情感的暴力防卫会反反复覆，爱恨交织。最终，我们能一起笑着面对这些爆发。我告诉他，他就像著名的爱尔兰狂战士库丘林（Cuchullain），在战场上陷入愤怒的「扭曲痉挛」，当他从战场上回来时，不得不浸泡在三桶冷水中（前两桶冷水沸腾后变成蒸汽），直到他准备好回到文明社会。有时，我们的会谈就像那些大桶水。有时，到了最后，麦可又准备好回到文明。他喜欢我叫他库丘林，他喜欢别人把他比作名战士。

与麦可的恶魔防卫进行谈判，就像进入阿富汗村庄与阿富汗战争领主谈判，同时寻求与他的女人和孩子会面。首先必须承认并充分尊重战争领主在其村庄和家庭中的救命角色……，给予这位黑暗天使足够的尊重。有了足够的认可和感激，守护族长慢慢似乎能放松下来，开始允许与躲在里屋地毯后面的孩子们接触。

黑暗天使进入移情/反移情

在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与麦可内心的阿富汗战争领主发生任何对质。我知道每当我介入他的「受害者/加害者」叙事、试图与他内心深处「年少」而脆弱的情感接触时，他都会非常「敏感」。他的整个自我照护系统（SCS）都是为了保护系统核心的天真而设计的，因此，如果我暗示他要对出错的事情负部分责任（比如和妻子吵架、和老板意见不合），他会在内心爆发，但绝不会向我表达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是害怕他的愤怒，才没有在这些时候咄咄逼人。

我们可以说，麦可的任何攻击行为都倾向于从正面移情中分离，并行动外化在他的公路爆走事件。然而，当他不断地向我报告这些事件时（当这些危险的、冲动的爆走持续爆发时），尽管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我开始感受到我自己版本的偏执焦虑及羞愧的失败感。

与许多早年遭受创伤性羞辱的男人一样，现代社会中几乎任何挫折都可能引发麦可的羞辱、羞愧和无助。他暴虐的怒火会立刻涌上心头。他一脚踩下油门、中指竖起来、「脏」字脱口而出，直到他和对方司机都在路边停下，麦克像一头野牛一样怒吼。如果对方司机也发疯了，不可避免地就拳打脚踢。原型的能量会涌向麦可，而他也暂时失去了理智。

有一段时间，公路爆走事件有所减少，但如果麦可在工作、婚姻或与孩子们的生活中出现压力，他就会经常退行回到以前的模式，公路爆走事件就会再次发生。作为他的治疗师，我开始感到无用和无助。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想知道为什么他的治疗没有效果，而我自己也开始有了同样的疑问。

接着就是黑暗天使接手治疗历程的那次会谈¹⁸。麦可走了进来，趾高气扬地（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承认他又发生了一次公路爆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他吓坏了个子小他一半的人。他又被彻底激怒了，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丁点悔恨（没有内疚或自责），只有这种暴力上瘾的亢奋。察觉到我的不快，他把话题转移到关于他妻子的一些「迫切」问题上。我气急败坏地坐着，带着那种熟悉的无助感和烦躁感努力倾听。我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个心理病态（他受伤太重，不适合心理治疗等等）。恢复理智后，我指出他在回避我们该谈的最重要事项并问他有什么感觉。「关于什么？」他冷嘲热讽地说。就在这时，我突然失去了理智（至少是分析的理智）。我现在完全被激怒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听着，」我说，....

你在威胁你生活中创造的一切（你的专业、你的家庭、你与妻子的关系、

¹⁸ 当代精神分析会将此称为典型的「付诸行动」（enactment），现在人们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双人关系事件，由患者和分析师身上的无意识情绪所驱动，在治疗危机中相遇（见 Maroda, K., 1998, "Enactment. When the patient's and the analyst's pasts converg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5, 517-535; Also Allan Schore, *The Science of the Art of Psychotherapy*, 2012, Norton, Chapter 5.)

你的孩子们、你与我的关系，以及你与内在那个小男孩的新友谊)，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你那小小的屎脾气。你以为自己是在讨公道或是在伸张某种病态的正义，但事实上你只是在像个两岁的孩子一样放纵自己。你只是情绪失禁！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你憋不住！你他妈的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忍耐？

「去你妈的！」他说.....把头转过去，怒气冲冲地.... 「我要离开这里！」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砰地关上身后的门，把自己锁在候诊室另一侧的洗手间里。我目瞪口呆地颤抖着坐了一会儿，然后跟在他身后，站在上锁的洗手间门外。

「麦可」，我说：「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我不该对你发火，这并不比你在高速公路上的表现好多少！不要让这件事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进去，我们可以一起处理这件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要谈。」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门从里面被打开的声音。我走了进去。他坐在马桶盖上，双手抱着头。我坐在浴缸上，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几分钟过去了，我们都回神冷静下来。然后，我发现麦可的双眼噙满泪水。我等着他说些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你现在有甚么感觉？」我问道。他抬起头看着我，看到了我眼中的泪水。他说：「我不知道..... 难过..... 我猜是对父亲的悲伤。」然后，麦可开始抽泣起来。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他说：「我必须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我总是在行为失控时大声呼救，但没有人理解我..... 在我 18 岁之前，我被捕过 4 次，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让我变坏。你没有让我变坏。」

「你没有让我变坏。」突然间，我胸中涌起一股巨大的宽慰和感激之情（宽慰是因为我真的在心里「让他变坏了」），而我为此感到糟糕。我真的恨了他一会儿（把他变成了黑暗天使），但这并没有毁了他，也没有毁掉我们。爱与恨、好与坏，在这一刻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在一起，但爱更强烈，因此我们的关系得到了维护和加深。这一刻就像我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共同脆弱却又共同超越的矛盾时刻）。麦可拉着我的手，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在这个湿润而美好的时刻看着对方。这就像希伯来圣经的基列香油（Balm of Gilead）（治愈与和解倾泻在我们俩身上）。创伤重演了、行动外化了，但又修复了，就在会谈中....，那个小男孩和谋杀的保护者/迫害者天使（在我们两人身上）都在场，同时开始了解对方¹⁹。

¹⁹ 麦可和我经历了 Paul Russell 所说的「关键时刻」（the crunch），他的意思是重复先前重要关系中发生的伤害（这里指麦可和他的父亲的关系），先前的关系无法接住强烈的情感。而这些伤害现在「作为一种危机和对治疗关系本身的威胁，被带到治疗情境中」。Russell 指出，当关系无法容纳和处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正面和负面情绪时，就会造成创伤。罗素说：「之所以会造成心理创伤，是因为个体必须试图自己涵容。」罗素说：「创伤的本质在于，如果没有[关系]涵容，情感会让个人失去关系。」（p. 25）这就是发生在麦可和他父亲身上的事情（也几乎是发生在他和我身上）。见 Russell, P., 1999, "Trauma 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Affects" in Trauma,

关于麦可和我共同经历的，有以下思考方式。与父亲之间没有共享情感的创伤太痛苦了，无法回忆，所以被解离了。但是，分裂和渴望治愈的情绪并没有消失。在内心深处，麦可无意识地寻找一份关系，在这份关系中，他可以再次经历这个创伤，但结果却不同。已故波士顿分析师 Paul Russell 说，「重复」与我们的无感有关，因此它行动外化，在行为中不带意识地重复。他说，重复强迫是一种「有组织的情感无能系统」，是功能失调的情感系统²⁰。

付诸行动（enactment）之后的梦

几个月后，在他的分析接近尾声时，麦可做了一个重要的梦。我觉得这个梦是我们合作的顶点。它展现了「父亲」和他所失去的孤儿「儿子」之间的疗愈与和解意象。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俩，成为我们后来反思时常会提到的重要意象。以下是这个梦：

我是警力的一员，我们正在追捕一个年轻人，他的年龄和我的大儿子差不多.... 10 岁左右。他看起来像个阿富汗孩子，被忽视的、迷失方向的。他手里拿着一份旧报纸。这个男孩多年来一直躲着我们，但现在我们抓住了他，我却感到疑惑。他看着我语带恳求地说：「是时候了吗？」.... 试探性地把报纸递给我。头版的文章是关于这个走失的男孩，以及他的父亲是多么希望他回来..... 他走失了、被遗弃了，或是被绑架了！那一刻，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仿佛他是我旧女友先前怀上的孩子）。我有着慢慢的悲伤与渴望。我只能说「我爱你」。我伸出手去拥抱他，醒来后深受感动。

这个美丽的梦预示着我们的治疗工作的重大转变，也预示着麦可的心灵发生了重大整合，他内心深处与父亲疏离的那个年轻部分显然是「他的」，但却变成了「坏的」（一个逃亡者，羞愧难当）。因此，由于「绑架」他的防卫系统，在接续的生活中丢去了自己。麦可在讲述这个梦的时候泪流满面，他认出这个迷失的男孩就是自己，他内心深处有一部分（在与父亲的关系中）受了深深的伤，这部分的自己正在挨饿和贫困（被遗弃在自己饱受战争蹂躏的内在景致中）。现在，报纸上说男孩的父亲「要他回来」，也就是说对于「当中最小的」整合，现在是可以想象的了。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窥见心灵是如何（象征性地）庆祝自身失去的整体性之恢复，以及庆祝分离部分的愈合....，一个父亲对丢失的儿子的拥抱。这是整合战胜解体，是心灵民主的胜利，是包容性的胜利，是冲突心理学战胜解离心理学，正是接受脆弱情感的勇气才使之成为可能。显然，这种接受只有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能实现，在麦可和我的关系中，爱比恨更强烈。

「意识」一词的意思是「知晓其他，即他人」²¹。「民主」一词来源于

Repetition, & Affect Regulation : The Work of Paul Russel, Teicholz & Kriegman, edtrs, London, Rebus Press。

20 Ibid., p. 7

21 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看到了这一点的某种「证明」。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有较佳的关系，不会分裂或威胁使用暴力。威权国家则经常退回防卫模式，加剧对他者的恐惧。北韓、俄罗斯或中

「*Demos*」，意为人民；「*Kratos*」意为权力，即只有透过人民、为人民、由人民产生的权力。就像心灵需要一个悲悯的双人场域来容纳冲突一样，人们需要民主机构、以宪法等立国文档为基础的法律和法院，来处理和裁决他们自身相互冲突的能量和观点，来表达自我，并共同承受身为人的诅咒和福泽。

从演化的角度而言，民主是地球上的新生物。它是人类意识的子嗣，被夹在两个威权存有（天使）之间，而这两个存有并不希望它好，它可能无法生存。而它能否存活取决于人类，那就是我们。

国等国紧张的国际关系就是例证。